

西方学者论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方学者论《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本开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32 千字

1983年2月第一版 198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2,000

书号：2253·001 定价：1.20元

目 录

1	西方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	
——编译说明		
15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	E·弗洛姆
15	前 言	
20	一、对马克思的概念的歪曲	
25	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35	三、关于意识问题，社会结构和暴力的使用	
39	四、人的本性	
	1、关于人性概念	
	2、人的自我能动性	
56	五、异化	
69	六、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	
78	七、马克思的思想的连贯性	
86	八、马克思其人	
89	后 记	
93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H·马尔库塞
144	自然和革命	H·马尔库塞
164	人类的产生	H·列斐伏尔
168	存在物的分析	
171	整体的活动	
177	已被掌握的领域和尚未被掌握的领域	
183	物质决定论	
185	社会决定论	

187	总体的人	
200	探索总体内容	
202	保卫马克思	L·阿尔都塞
202	我为什么反对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210	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	
218	论青年马克思	
247	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	
254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	
276	物化和无产阶级的意识	G·卢卡奇
277	物化现象	

西方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的研究

—编译说明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问世。1927年，莫斯科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收入了《手稿》的部分内容，题为《〈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手稿》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全文发表是在1932年，当时有两个版本同时问世：一个是莫斯科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编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由B·阿多拉茨基主编；另一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合编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著作》第1卷。但后一个版本略去了第一个手稿，在编排和字迹辨认上也有不少混乱和谬误之处。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是前一个版本。后来，苏联研究者还对这个版本作了修订和核正。

苏联研究者对整理出版《手稿》作了巨大贡献，可是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对《手稿》的内容并没给予多大的注意；直至五十年代以后才陆续发表了若干有影响的专著。而在西方，《手稿》全文发表的当年，就有一些研究者相继发表论文，对《手稿》加以注释。四、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研究《手稿》的论著更是接连不断，出现了被称为“《手稿》热”的现象。特别是许多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理论家，不仅对《手

稿》的思想内容作了种种解释，而且把这种解释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因而对于《手稿》的解释又成为流行于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来源之一。自然，绝大多数西方理论家研究《手稿》的立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理论思潮，却不应忽视。下面，我们对西方的有关研究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

早在1923年，当时是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卢卡奇出版了本世纪最有争议的著作之一《历史和阶级意识》。他在书中强调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及其意识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并且提出“异化”（卢卡奇当时用“物化”这一术语表述）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卢卡奇的这些观点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不少西方学者正开始探讨一种既“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又不同于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把“人放在首位”的、以“异化理论”为核心的所谓“新的马克思主义”。但使他们感到苦恼的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直接的理论根据。

1932年，《手稿》公开问世。这些西方学者以为在《手稿》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理论根据。他们宣称，从《手稿》中发现了“真正的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从此，在西方世界就出现了曲解《手稿》，并进而曲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加以人道主义化的思潮。

从1932年至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这股思潮中最有影响的便是所谓“两个马克思”论。鼓吹这种观点的学者把《手稿》同马克思后来的著作对立起来，用《手稿》来否定马克思后来的成熟著作。他们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

义，就把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详细阐述的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认为《手稿》的人道主义理论才真正代表了马克思的思想。

“两个马克思”论的始作俑者是朗兹胡特、迈耶尔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德曼等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著作》一书的前言中说，《手稿》“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节点”，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手稿》的“中心思想”就在于否认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所确认的“把通过剥夺剥削者所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废除剥削看作是历史的真正目的”，而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1932年）一文中也声称：“马克思的任何一部其他著作，都不象这部著作这样清楚地展示出隐藏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后面的人道主义主题”，他还说，“马克思的成熟的顶点是在1843年至1848年之间”，“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这些著作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有人根据这种“两个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回到青年马克思去”的口号。

这些“两个马克思”论者不但把《手稿》同马克思后来的著作对立起来，而且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他们所反对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指恩格斯以后的许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也包括在内。德曼说：“或者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算作马克思主义，那么，无论是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作者认为布哈林是第三国际主要理论家。——引者），都必须彻底地重新加以修正；或者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算作马克思主义，那么就另有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们

可以引证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朗兹胡特说，“全面地看看马克思三十岁以前的著作，就会更加清楚：马克思精神世界的全部丰富内容，被迄今为止的马克思思想的阐述者缩小到何等狭小的范围，被‘唯物主义地’弄得多么贫乏”，因此，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全部丰富内容已成了“当务之急”。

苏联学术界不少人把马尔库塞也列入“两个马克思”论者。实际上，马尔库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年），论证的是《手稿》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致性。他认为，对于人的研究，不但是《手稿》的中心问题，而且也是贯穿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的一根主线。但是，在五十年代以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少数。

五十年代以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改变了那种通过贬低和否定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来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办法，而是抹煞《手稿》同马克思的后期著作的区别，强调“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是统一的，即统一于人道主义的理论。

有人估计，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西方出版的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专著就有上百部，论文达数千篇。这些专著和论文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用《手稿》的人道主义理论来解释和概括整个马克思的思想，认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他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坚持人道主义理论的青年马克思和另一个抛弃这种理论的老年马克思的话，

“那么，人们宁愿要青年马克思，而不愿要老年马克思，宁愿希望把社会主义同前者联系起来，而不愿跟后者联系起来”，但他认为，事实上，马克思后期著作所运用的概念“是青年马克思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概

念的继续”，“在《手稿》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思想”，“在撰写《资本论》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中又继续占有中心地位”。必须指出，这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马克思前后思想的统一，并不是指“马克思的后期的思想是在早期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指：“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只有用《手稿》的理论指导才能得以说明”，“马克思后期的全部‘新发现’都可包括在《手稿》的‘人本学’之中”。如西德哲学家伊·菲切尔说：“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只有根据《手稿》等早期著作才能了解其全部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埃·蒂尔也说，“没有《手稿》所提供的那个指导线索，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较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线索”就是“对人的本质和任务的理解”。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以后只是从这个体系中派生出一些新的论题而已。

这些西方学者不仅抹煞马克思早期理论和后期成熟的思想之间的区别，而且抹煞《手稿》所反映的人道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用各种时髦的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对《手稿》的思想加以曲解（西方对《手稿》的研究者，有许多是西方一些重要哲学流派的重要哲学家），从而把《手稿》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改铸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

在这一时期，他们还把对《手稿》的研究同对斯大林的批判、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遭遇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推动了这股思潮的发展。这种以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为标志的“《手稿》热”，被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他写道：“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的时候，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具有鼓舞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这股思潮

不仅盛行于西方，而且蔓延到东方。东欧各国出现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人文学派等等就是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波兰人文学派代表人物沙夫自称他的思想深受弗洛姆的启发，弗洛姆还为沙夫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个人》的英文版写了序言。

六十年代以后，正当这股思潮发展到全盛阶段时，西方又出现了与之对立的另一股“反人道主义”思潮，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他认为，那些热衷于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人，由于“复活‘人’、‘人性’、‘异化’等陈旧的哲学术语”，把马克思返老还童，因而使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的危机。他认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有着截然不同的主题，前者是人道主义，后者是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是反科学的“意识形态”，而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独创的“科学”。他还说，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理论，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手稿》是属于马克思思想的“黎明前的黑暗的著作”，尽管从时间上说《手稿》离马克思真正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八四五年很近，但其思想离马克思主义最远；马克思是在与《手稿》的人道主义理论彻底决裂后，才达到了“科学的历史理论”。

阿尔都塞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属于人道主义思潮的西方学者当然对阿尔都塞的观点加以猛烈的抨击，即使对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持一定批判态度的苏联、东欧的一些理论家对阿尔都塞的观点也并不赞赏。他们认为，阿尔都塞完全否定《手稿》，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容，犯了极端化和片面性的错误。

时至今日，这两股对立的思潮仍处于“两刃相割”的局面，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二)

如前所述，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观点解释《手稿》是西方研究《手稿》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西方学者分属于各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他们从各自学派的理论出发解释《手稿》，改造《手稿》，实际上是借对《手稿》的诠释，发挥本学派的理论。西方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相应地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手稿》的解释。下面是主要的几种：

新黑格尔主义。迈耶尔、麦克默里这些最早对《手稿》的解释，就属于新黑格尔主义的解释。以后用新黑格尔主义解释《手稿》的最著名的代表是J·伊波利德，此外还有P·邦奈尔、赫·莱希等人。他们认为，《手稿》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都继承了黑格尔的传统。他们提出，《手稿》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过来的哲学方法论的主线”（赫·莱希），《手稿》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批判费尔巴哈用生物学观点看待人，而是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看成自然一部分的唯物主义立场，所以，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又回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他们特别指出，作为《手稿》中心范畴的“异化概念”就“直接地是从黑格尔那儿来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但构成了《手稿》的理论，而且构成了整个马克思学说的‘精髓’”。

存在主义。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在三十年代论《手稿》的著作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主义色彩。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存在主义的广泛流行，用存在主义解释《手稿》也成了热门。其代表人物有埃·蒂尔、H·波尔茨、保罗·蒂利希等。至于当代最著名的存在主义者萨特，虽然没有发表研究《手稿》的专著，但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无疑同他对《手稿》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存在主义者根据自己对《手稿》的解释，

把马克思说成是“同克尔凯郭尔一样的存在主义的先驱者”（蒂尔），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同存在主义一样把个人的存在作为一切存在的出发点，“把人的事实构成哲学的直接主题”，而且《手稿》中马克思“用以描述我们的历史性的社会的种种概念”，“正是直接地属于存在的结构的概念”（萨特）。他们用存在主义解释《手稿》中关于人的概念和对异化根源的理解，说马克思把一切社会矛盾归结为“人的本质与存在之间的矛盾”，而把异化的根源追溯为“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矛盾”（马尔库塞）。存在主义者中的有神论者如蒂尔、蒂利希还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门宗教。

新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主要用新弗洛伊德主义解释《手稿》，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同《手稿》糅合在一起。他们把《手稿》中所阐述的异化这种社会现象解释为弗洛伊德曾经论述过的“心理病态”，是人对世界的“消极被动的体验”（弗洛姆）。他们以《手稿》中“一切属人的感觉的特性的彻底解放”这句话为依据，认为论述人的感觉、本能的解放是《手稿》的“中心主题”（马尔库塞），马克思象弗洛伊德一样把“人的本能的解放”作为“整个世界获得解放的起点”。他们用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解释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认为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把人的解放归结为劳动的解放是正确的，但隐藏在劳动背后支配人的劳动的还有“深一层”的人的本性，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人追求快乐的欲望，即真正构成人的本质的心理力量——性欲力，所以劳动的解放实际上是性欲的解放。

新托马斯主义。一些新托马斯主义者，如P·比果、J·霍梅斯、Y·加尔维等，竭力论证《手稿》同新托马斯主义哲学“讲的完全是同一个东西”。他们认为，《手稿》在基本内容上是宗教，只是在形式上是非宗教的。他们说：“马克思把

人看作绝对者，先验性这一思想是他的一切论点的基础”，“《手稿》具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预言性特征”，因此，“不一定要把马克思的思想推敲得太多就能从中发现一个宗教的意味”（比果）。他们硬说《手稿》的异化理论是由宗教异化和世俗异化这两大部分构成的，而马克思也把形形色色的世俗异化看作是由宗教异化派生出来的。他们还论证说，《手稿》所讲到的无产阶级是上帝的代名词，“马克思下意识地把无产阶级当作了人——上帝”。在基督教中，“基督在实现着应该由无产阶级实现的革命”，而在《手稿》中，“无产阶级执行基督的职能”（卡尔维兹）。

结构主义。阿尔都塞并不是把《手稿》的理论解释成一种结构主义，而是在解释中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他提出，“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这个整体由其特有的总题目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一切都取决于总题目的性质，它是组成部分的前提”，所以必须把《手稿》看作是一个整体，从《手稿》的结构出发解释《手稿》，决定《手稿》性质的是隐藏在《手稿》内部的“总命题”。他根据他提出的所谓“依据症候的阅读方法”，认为《手稿》的“总命题”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坚决反对把《手稿》分成那些是唯物主义那些是唯心主义，那些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残迹”，那些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做法，认为《手稿》的所有组成部分都统一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问题系”。

此外，还有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生科莱蒂对《手稿》的实证主义的解释，以及胡克的实用主义的解释等。

(三)

在研究《手稿》的西方学者中，有不少是号称“西方马克思

主义者”的理论家，他们对《手稿》的研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西方最早对《手稿》进行研究和注释的，就主要是他们。他们往往又是一些西方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热衷于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观点解释《手稿》，寻找所谓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共同点”。上面介绍的对《手稿》作存在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解释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手稿》的研究，影响大，流传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本书编译的文章就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手稿》的有代表性的论述。

美籍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1900—198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他的解释《手稿》的专著《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出版于1961年，在西方流传很广。在这本书中，他总结了他以前以及他同时代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论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目标、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人道主义，它的目标是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把人的物质需要的不断满足和人性的解放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针对“其收入的分配方法”，而是针对它的毁灭人性；马克思关心的不是“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而是“使工人能够具有完全的人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精神的存在主义”。弗洛姆是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从该书关于人性及其异化的问题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他提出，性欲和饥饿等人的本能是人性的基本构成部分；人性的异化是心理的病态，是人的感性的丧失、本能的压抑，异化是人的本质所固有的现象，消除异化需要进行心理疗法。他还对“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批判，把极权主义和马克思

主义混为一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另一个美籍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1898—1979）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西方学者第一批研究《手稿》的重要论文之一。有的评论者认为，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的解释“提出了一个纲领”，“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解释奠定了基础”（东德哲学家布尔）。马尔库塞曾求学于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所以这篇论文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用存在主义改铸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代表作。他提出：“《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这种新的基础就是人道主义。他认为，《手稿》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人的真正本质”，“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看成是一般的人”，是“‘类’的存在物”，人能够自由地和一切存在物发生关系，人能这样做的基础就是劳动。他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出发点是“表现在劳动的外化和异化中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外化，在资本主义历史性事实中的人的遭遇”。“正是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准确的观察，变成了指引彻底革命的不屈不挠的推动力”。真正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抛弃一切财产，而是要回到这种财产的“真正的人的形式”。所有这些论点后来都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革命新理论”的重要内容。

马尔库塞的另一篇论文《自然和革命》选自他的《反革命和造反》一书，该书出版于1972年，是马尔库塞在1968年的以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的学生运动失败后，作为对这次运动的总结而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引证《手稿》的有关论述，说明开展人的本能结构革命的重要性。他提出，《手稿》信奉的是一种“最激进的整体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把个人的感觉的解放当作是“普遍解放的起点、基础”，“自由社

会植根于新的本能需求中”。他用弗洛伊德的语言大谈性欲解放和妇女解放运动。他还以《手稿》为理论根据，阐述了当前流行于西方的反对科学技术、反对“控制自然”的所谓“浪漫主义思潮”的观点。

列斐伏尔（1901——）的《人类的产生》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后半部分，该书出版于1938年。这部著作不但被论者认为是“列斐伏尔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最出色的一部”，而且也被列入西方研究《手稿》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他在书中复述了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理论以后，提出了“总体的人”的概念。他认为，人的本质“首先是抽象的潜在性”，只有通过自己的活动才使自己分离出来，而这一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使人类遭受了痛苦和不幸。这种存在于人的本质中所固有的矛盾，只有“总体的人”才能解决。列斐伏尔的这些论述，对萨特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影响。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有些思想显然与本书有一定渊源关系。

上述这些文章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流派对《手稿》的研究。阿尔都塞（1918——）的几篇论文则代表了“反人道主义流派”的观点。阿尔都塞的这些论文均写于六十年代，收集在题为《保卫马克思》的论文集中。这些论文并不都是专门论述《手稿》的，但它们都评论到人道主义流派对《手稿》的研究，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流派对《手稿》和青年马克思的看法。

《我为什么反对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原是阿尔都塞为《保卫马克思》的英文版所写的题为《致英语读者》的序言。这个篇名是我们加的。他在这个序言中分析了出现推崇《手稿》、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这种思潮的社会历史原因，指出了这股思潮给马克思主义已经造成和将要造成的危害。